

■作家故事

大先生

□孙翠翠

见到孙正聿先生时，我刚刚读完他的《哲学的目光》一书。当他从吉林大学匡亚明楼的走廊深处迎面走来时，在我的眼中，步子和缓、目光深沉的他，便恰如一卷行走的书籍。

我心中暗想：果然，先生之大，不在形容，而在气象。

步入孙正聿先生的办公室，四壁皆书。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就放在桌角，黑色封皮的一角稍有磨痕，书页间夹着各色纸条，页边是密密麻麻的批注。《小逻辑》的右侧，平放着一篇文章《像先生那样生活》——这是他为恩师高青海逝世二十周年所写的。纸页静默，思念有声。

在谈起他的老师高青海时，我问他，一个为人师表的人，怎样做才是真正的不辱师名？

他沉思片刻，总结有三：做大写的人，做大学问，做大先生。

我想，这不仅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，也是他对老师高青海的敬佩，更是自己一生的志业追求。

孙正聿用“伟岸”一词开启了对老师高青海的追忆。

那是1978年3月，孙正聿刚刚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。北国春寒，枝丫未萌，西风里还夹带着一丝凛冽。高青海先生一身黑衣，正于文科楼前跑步。他身高一米八有余，步伐沉缓，目光如炬，不怒自威，让孙正聿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“伟岸的身躯”。

让孙正聿深切体会到“伟岸”一词的精神分量，还是在后来的接触当中。

孙正聿本科毕业时，高青海先生正在撰写《哲学的憧憬》一书，原本决定让孙正聿做他的助手。可仅仅过了一天，高青海先生就主动找到孙正聿，坦诚说道：“正聿啊，我反复想了，你还是别做我的助手了。你在班里年龄偏大，跟着我做助手，会耽误你开展独立研究。你留校当教师，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学术潜力。”在高青海先生的心里，他宁可自己多承担撰写工作，也不愿

影响学生的长远发展。

在高青海先生生命的后期，病榻上的他苍老、衰弱、无力，甚至难以对抗身体的疼痛，但他始终一声不吭，依然艰难地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章——《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》，呼吁哲学家们要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。他说：“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……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，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，哪怕它黄金遍地，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。”

2004年，高青海先生与世长辞。这篇论文成为他临终的思想嘱托。在送别先生的日子里，孙正聿在《用什么告慰先生》一文的结尾处写道：“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，也许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。先生在看我们。”

近些年，孙正聿的一系列哲学讲座视频在网上很受年轻人欢迎。常有网友在评论区问：做学问有没有“捷径”或是“秘诀”？孙正聿的回答只有两个字——“笨想”。

“笨想”是高青海先生的治学方法，也是中国当代哲学“吉大学派”别具特色的学术风气。高青海先生就是用“笨想”的方法，一生做着立意高远的“大学问”。为了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，他写出了史论结合的《哲学的憧憬》、独树一帜的《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》等一系列著述，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，为新世纪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。孙正聿则继承“笨想”之法，写出了《哲学通论》。这本书既是孙正聿本人也是“吉大学派”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，影响了一代代哲学学子。

什么叫“笨想”呢？

孙正聿说，所谓“笨想”，就是不投机取巧，不要小聪明，抛开一切文本，悬置一切成说，面向事情的本身思考——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不知不觉，我和孙正聿先生已经交谈了足足

两个小时。他点燃一支烟，烟雾袅袅中，墙上石英钟的滴答声更加清晰。那声音像一把钥匙，忽然打开了一条时光隧道。我仿佛看见，许多年前的那个青年孙正聿，又一次坐在书桌前，铺开一张崭新的A4纸。周遭的一架架、一排排、一册册书，渐渐退为模糊的背景。只能听见笔尖沙沙作响——数十年苦读所积攒的文献，“笨想”所淬炼的思想，正从他笔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某一瞬间，烟雾那端伏案的身影仿佛不再是他，而是他常常追忆的高青海先生。两人身影叠合，不分彼此，皆以最扎实的“笨想”之道为人学学，俯首耕耘，静默前行，追求着、攀登着他们心中永无止境的“大学问”。

高青海先生曾在自己执教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感言，自己一生有两大幸事：“一是遇到了好的老师，二是遇到了好的学生。”这话平实，却道出了学术传承中最深的缘分与慰藉。先生当年之言，如种子般落入时间的土壤。许多年后的今天，孙正聿回望来路，也发出同样的感慨。

何为“大先生”？如何做先生一样的“大先生”？孙正聿正是先生之所以为“大先生”的见证者。读大二时，高青海先生为学生们讲《西方哲学史》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哲学史应该是死记硬背的知识性的东西，高青海先生却手绘了一张地图。他边画图，边告诉学生们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，是如何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的。为什么那些哲学家会提出来世界的本源是水，是空气，是无物？那一堂所有人都以为会枯燥乏味的《西方哲学史》竟一下子抓住了孙正聿，也为很多学生打开了热爱哲学的大门。

读大三时，孙正聿拿着自己的哲学习作《试论黑格尔（逻辑学）的开端概念》给高青海老师看。没想到，高老师竟在这篇习作心得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。在他认同之处，还画上了重重的波浪线，批注“有思想”“有见地”；在他不以为然之处，则画上了重重的横线，写下“再想一想，是否如此”。



1986年，孙正聿考上了高青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。高老师一再强调：“我也没读过博士学位，我更没有指导过博士研究生，所以，我就和你们一起学吧。”那时候，连同孙正聿在内的几位“老学生”每周都要去高老师家。“老学生”轮流发言，高老师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，然后再向他们提问。几位“老学生”更是相互追问，相互诘难。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，就是在这种交流中形成的。

多年以后，孙正聿同样现场手绘地图，将原本枯燥乏味的《哲学通史》课讲得趣味横生。上百名学子拎着小马扎早早地挤在礼堂里，成千上万哲学爱好者则坐在手机前等待线上直播。

即将80岁的孙正聿先生，如今仍然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，每天坚持写作六个半小时。每天晚上散步时，他依然会走到匡亚明楼下，望着四楼的那些窗子，数一数，有多少个窗户里还亮着灯……他像一个不吝心力的农夫一样，在注视着、祝福着他亲手栽培的小苗。不知不觉间他也长成了他的老师——一个真正的“大先生”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与孙正聿先生的这场谈话，已经过去了许久。此刻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心里仍激荡着一种向上、向前的动力。我想，这就是“大先生”的力量吧。他可以让一个普通人，愿意以其为榜样，愿意成为拥有那样境界的人而不断规范、修炼自己，扎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吹火筒

□罗大伦

吹火筒，是乡下的助燃器，也是农家厨房必备的工具。

在故乡洪雅，吹火筒由不到两尺的慈竹筒制成。通常保留三个竹节，前两个竹节打通，在第三个竹节凿一个圆圆的小孔。第一个竹节用于吹气，里里外外刮得溜光，第三个竹节用于出气。竹节下面削成微微尖的嘴，既好看，又便于把气柱拢成一条线。

彼时的农家，烧柴做饭使的都是土灶。灶膛里的柴火，有树枝、竹丫、稻草、灌木。农家干透的柴火没有那么多，使用时一般是干透的柴火掺杂着半干半湿的柴火。柴火在灶膛里燃着燃着，忽然就熄了，而锅里的米饭或蔬菜正需要旺火呢。这时候就赶紧拿出吹火筒，对着灶膛里的火星使劲一吹，柴火便又燃烧起来。

儿时的清晨，炊烟像一条柔软的绸带，从青瓦屋顶袅袅升起。灶膛口，母亲坐在凳子上，身体前倾，左手拿着吹火筒，右手按住灶门，嘴唇贴近竹筒，“呼呼”几声，暗红的火苗猛地一闪，柴火立即“噼啪”作响，随即吐出金黄的火舌，映得母亲两腮通红。我蹲在灶门旁，看火苗，看母亲，也看吹火筒。我不禁觉得这个吹火筒很神秘，于是偷偷伸手去摸，却被母亲用手轻轻拍开，说：“别闹，火要熄了。”

母亲愈是不让我玩吹火筒，我愈是觉得那是一件神奇的东西：吹火筒里一定藏着风，藏着火，只要一拿起，就能成掌风掌火的人。要不然，为什么用嘴轻轻一吹，风儿火儿就能从尖嘴处出来，把奄奄一息的火星救活呢？我也想当掌管火火的人。

于是，我趁着母亲外出割猪草，家里没人的时候，拿出吹

火筒来仔细地翻看。看到尖嘴处的洞那么微小，我突发奇想，这个出气洞那么小，如果大一点，是不是吹出的风、吹燃的火，就会更大呢？我决定帮帮母亲。于是，我找来小刀片，将小洞慢慢削大。做好后，我想给母亲一个惊喜，偷偷将吹火筒放回原处。不料晚上母亲使用吹火筒时，使劲一吹，却吹不出气来了。再一看，出气的洞口被削大了，忙问谁干的？我吓得躲在屋角，不敢吱声。

吹火筒不仅是助燃器，还是我们的玩具。没人在家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将吹火筒带出家门，把尖嘴对着天空，可以“发射”看不见的炮弹；把尖嘴平端在手里，能吹出“呜呜”的号角。有一次，二姐惹我生气了，做饭时趁她不注意，我用木炭将吹火的地方画个圈。灶膛里的柴火熄后，二姐要我将柴火吹燃。我假意说肚子疼，要上厕所。二姐只好自己拿起吹火筒吹火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发现二姐的嘴唇周围有一个黑圈，就像长出了胡子一样，于是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随着电磁炉、电饭煲、液化气、天然气走进乡村，吹火筒和蓑衣、斗笠、木犁一样，逐渐成为乡村的历史，但它的文化价值也逐渐体现出来。吹火筒，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，它吹着生活的希望，吹出童年的快乐，也吹燃一个游子的乡愁。

我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，是十几年前被称为崇文区的地儿。崇文区因有崇文门而得名。崇文门外和崇文门内隔着城门楼子、城墙和护城河，故一直有“城内”“城外”之说。如此一来，我住的地儿具体说应是崇文门外，再深入一点，是东花市。边上还有北花市、西花市、南花市。据说在过去，花市是北京一处独特的地域——到处是鲜花的海洋，是全北京城最好、最大的花卉交易之地。

至今为止，我这个南方人在此地住了二十余年了，却没看到大的花市。周边倒有几家零零星星的小鲜花店，还有大大小小的超市，以卖水果、各种生活用品的居多。不过，吃的地儿倒不少，像什么“花舍咖啡”之类的，恋爱时与先生常去。商场也有几个，中等规模大小，离长安街、王府井也不远。

家周边物资供应齐全，基本可以满足生活需要。再加上我是个生活极其简单的人，除了必要外出的工作外，我的日常轨迹大部分都是两点一线。从富贵园四区往东步行六七分钟到我家的另一处院子写写画画、喝喝茶、见见朋友，一天也就这样打发了。

院子出口对街的楼群里，有明朝名将袁崇焕的墓和祠。说是古墓，其实就是一个衣冠冢，一直有守墓人照看守护，似有三百余年之久。以前还可以过街从院墙旁一小铁门过去瞻仰，现在铁门被“铁将军”锁上了，进去得从邻近的本院园二区穿过去。

从院子往西走100米便是一所著名中学——广渠门中学，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班是“宏志班”。再往东走几百米，就到广渠门桥了。桥底下有一条护城河，河面不宽，但长得看不到尽头，向东一直可以通到北运河故道。

从院子往北走七八百米，则会看到一截古老的明城墙。如今那里修了地铁。只剩一截的明城墙，沉甸甸地立在这里，像一个巨大的青灰色的火车头，把六百年的兴衰荣辱都压在了沧桑的砖缝里。这截城墙虽然没有了当年恢宏的气势，但依然是北京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。

每年4月，当春光聚集的时候，游园会便会隆重举行。花瓣随风飘扬，似一场晚到的春雪。和煦的阳光普照，筛过树梢，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美丽的锦裘。风过时，树底落英缤纷如雨，看上去似一团团的粉雪，人眼皆是一幅幅明艳的美景。

清明那几日，虽然温度略有下降，好在没下雨，太阳也照常出勤。看着周边的玉兰、杏梅、海棠竞相开放，心忖，北京的春天是真的来了，虽然迟了一点。我徒步而去，坐在明城墙角的石头上。嫩黄的连翘迎风摇曳，槐树的小嫩叶亦开始慢慢绽露尖角了，叶尖悬着几滴未落的露水。晨曦下的海棠，带着几分昨夜水润的娇憨。

看着这一切，我发了好一阵呆，连呼吸都变轻盈了，生怕惊扰了这美好的春日。一阵风吹来，树叶“沙沙”作响，阳光透过叶隙洒在城墙平整干净的青石板上，有一种来自心底的悸动。我脱下鞋，踩着光斑慢慢往前移，心情恰似被风卷起的衣袂。想想自己那一点支离破碎的心事，顿觉也不过如此。半日浮生之乐竟然如此令人愉悦满足。春天真的是让人爱慕极了！

我和崇文门

□杨清茨

流淌在资水的劳动号子

□廖静仁

那地方名叫五岗洲。

那地方多树木杂柴。整座整座的山冈，都被林木拥挤得黑黑森森如长夜。每年，五岗洲的人都要从山里有计划地伐倒一批批木材。年轻壮实的汉子们将其编扎成排，一路颠簸送往益阳。也有更远的，要漂过八百里洞庭，再乘风破浪去往湖北汉口……

这也就不难想象出驾排人的艰辛了。但是那驾排人，对于艰辛也如同对付每天的茶饭一样，是吃惯了的。谁也不会畏惧。这大概并不全是为了得到一笔工钱吧——能展示自己的骁勇豪迈，又能展示劳动的健美阳刚，那才是真的惬意和欢悦呢。

木排的体积十分庞大。一队木排起程，倏忽把资江也都挤得水泄不通的了。那阵势，很是壮观。况且每一叶排上，又都有五六条年轻壮实的汉子。他们习惯于把一根长纱巾拦腰紧紧捆着，开排时，齐崭崭扯开嗓门呼喊起劳动的号子来：

哟哟哟——嘿！

呃哩喂哟——嗨！

声音粗犷、激昂。壮美的劳动号子随着浪涛在江峡中撼来荡去。

驾排的最佳时节，是冬末春初。因为这时农活已经闲了，江里的水，也要比秋夏之际充足一些。只是气温低了，有时碰巧开排后，会遇上雨雪天气。那种滋味，是不太好尝的。然而汉子们当中没有人叫苦，也不会有人要求靠岸，等到天晴气候暖和了再开。他们都带了足够的老白干，冷，就大口大口地灌酒。其时，若有一两艘水上船远远驶来，汉子们就都乘着酒兴，声嘶力竭地骂出些粗话野话，灌进船上人的耳朵里。

资水滩多，弯同样也多。就在汉子们只顾着开心的时候，排身一抖，“哧”地就被拐弯处的崖嘴拦住了。其实，就是汉子们都全神贯注，木排搁浅也是常事。而往往前面的木排搁浅了，后面的许多排也就不停下来。在资水上驾排的人，同艰苦，共患难，这是深深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的。

木排搁浅了，而且又是在没有人烟的拐弯的滩头搁浅

的。方圆十里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油盐。就算吃的不成问题吧，放排时间已经成了常规的，是不能破例的。要是哪一趟延长了天数，回到家里后，堂客又会数落，说准是荷包里有钱了，到汉口玩乐逛街进戏园子了。因此，就这样干待在排上等涨水冲排——这想法，谁也不会产生的。

他们只晓得仰起脖子来，把老白干咕噜咕噜灌进肚里，直到全身心都火烧火燎了，呼呼地喘着粗气了，就有人对着北风雪雨脱衣衫。“哗”的一声，毫不犹豫地赤条条地跳进了浸冷浸冷的江中。于是，紧接着又有了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

渐渐地，那黑红色的肌肤，就变得紫了、乌了，活像一尊尊立在激流中的铜像，有意向天地间展示并炫耀着一种劳动的健美与阳刚。

哟哟哟——嘿！

呃哩喂哟——嗨！

汉子们就这样拼命地推着搁浅的木排，竭力呼喊着重水的劳动号子。他们用那一副副粗犷的嗓门，呼喊出生命的顽强，呼喊出劳动的欢乐。

